

孫中山的蘇聯顧問，1920~1925

韋慕庭

- 一、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先驅
- 二、孫中山和趙飛的具體討論
- 三、鮑羅廷的背景和任務
- 四、孫中山和鮑羅廷開始共同工作
- 五、改組國民黨
- 六、軍事上援助孫中山
- 七、組織廣東農民
- 八、對孫中山在意識型態上的影響
- 九、孫中山和鮑羅廷最後的關係
- 十、結論

本文的目的在檢討孫中山晚年與蘇聯的關係。我們所提出的問題是：(1)俄國革命政權如何決定援助孫中山，而孫中山又如何決定接受俄援？換言之，雙方為何合作？(2)俄國對孫中山提供了哪些援助？(3)與孫中山一起工作的蘇聯公民和共產國際代表的背景、遭遇如何？我們不擬討論孫中山死後俄國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援助這個大題目，我有一本已完成而即將出版的書就是討論這個題目。此外，本文也不會談到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

關於「雙方為何合作？」這個問題，最簡單的答案就是雙方都看出合作對本身有重大利益。然而他們的目標並不一樣，雙方在磋商了四年左右後才正式合作。從孫中山這方面來看，我們可以根據歷史證據，指出他在其革命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裏，都不斷尋求各個外國政府的援助。我在一本名叫「孫逸仙：挫折的愛國者」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七六年出版) 的書中，對此即有闡述。他經常需要款項來資助革命，也總希望外國能承認他所成立的反對北京政府的政權。然而，在爭取外國財力支援方面，他並不十分成功，也從未說服任何外國政府承認他的政權，但他仍奮戰不懈。

孫中山一生的大半時間都是個革命領袖，他對其他各國的革命十分注意，並自認是個社會主義者，因此他對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自然非常有興趣。那次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距離中國推翻滿清的革命只有五年。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結果使孫中山極為失望。同時，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鑑於歐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野蠻，也對西方世界不再存有幻想；孫中山反對中國參加歐戰，並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協助成立了廣州政府。然而一九一八到二〇年是他政治事業的低潮。一九一八年五月，廣州「非常國會」將他從大元帥貶為七總裁之一，他黯然離開廣州，退居上海，埋頭撰述「實業計畫」，希望這項大計畫能吸引在歐戰中獲勝諸國的財力和技術援助。一九一九年七月和一九二〇年九月，加拉罕 (Lev Karakhan) 兩度發表對華宣言，自動提議放棄沙俄從滿清政府取得的各項在華利權。孫中山對蘇聯的慷慨也許印象十分深刻，因為中國雖然是戰勝國之一，但一九一九年四月的凡爾賽會議，卻把德國在山東的利權轉贈給日本。這件事激發了著名的五四運動，而五四又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鋪平了道路。這就是孫中山晚年革命事業的背景與環境；他就在這種情況下，開始考慮接受蘇聯的援助。

蘇聯領袖又為什麼會援助中國和孫中山呢？這些領袖不少在歐洲住過，對歐洲比較熟悉，對中國則所知甚少，但他們當時面臨著一個緊迫的問題——把日本與其他協約國的軍隊逐出西伯利亞東部。更大的一個問題，則是如何保證中蘇漫長邊境的和諧。蘇聯政府需要得到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認（北京政府直到一九二四年仍然承認沙俄政府的殘餘代表），而且俄國的新領袖也希望將他們的革命擴展到歐洲和其他地區。他們對德國便寄望甚高。加拉罕在一九一九和二〇年的慷慨提議，象徵著俄國在外交關係上的革命性觀念，但不久蘇聯的外交部就變得比較實際了。

列寧眼見革命後的俄國幾乎被敵視它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便於一九一九年組織了共產國際，並發展出一套瓦解列強（尤其是英、法、日、美）的策略，那就是在它們的殖民地中鼓動革命。他在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了這個想法。用可能過分簡化的話說，列寧的基本想法就是支持各個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藉此削弱列強。他相信這些解放運動必須由資產階級領導，而各國

共產黨必須在革命的第一階段中，幫助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同時維持本身的獨立，組織本身的階級力量，以備在下一個革命階段中奪權^①。共產國際採納了列寧的計畫，並將這項計畫作為指導它和一九二〇~二一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之間關係的政策。不過這項理論後來經過多次修正；直到三年以後，蘇聯領袖詳細探究了中國的政治局勢，這才判定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俄國應該加以援助。他們希望指引孫中山和改造他的黨，使兩者從俄國的革命經驗和目標看來，都能更有效力。可是另一方面，俄國政府仍然爭取北京政府——孫中山所希望推翻的政府——的外交承認^②。

在一九一八到二二年之間，孫中山對革命後的俄國逐漸產生興趣。根據他寄給列寧的零星通信（由蘇聯外交部長翟趣林作覆）和他與蘇聯或共產國際代表的談話來看，他的興趣有幾項主要特點：這幾年在俄國是內戰與饑荒頻仍的歲月，孫中山對俄國革命極表同情，並在心理上將俄國革命和他自己的革命等同，也將列寧和他本人等同；他急於知道蘇聯的最新情況，認為蘇聯的革命經驗對他會很有價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當他重回廣州，二度成立政府時，曾對自己和蘇聯相隔太遠表示不滿；他希望獲得蘇聯的直接軍事援助，並考慮由支持他的中國軍隊和蘇聯紅軍中的華人部隊，合力攻佔北京。他因此反對俄國在他佔領北京、成立新的北京政府以前，尋求現有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認^③。

一、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先驅

討論了一般的背景以後，我們現在來看看那些到中國見過和協助過孫中山的蘇聯及共產國際代表。其中第一位比較重要的是胡定康 (Gregory Voitinsky)，一位廿七歲的共產國際代表，一九二〇年奉派來華協助發展中國共產黨（他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合作，本文暫不討論）。雖然他和孫中山有六個月的時間同在上海，但

① 西方關於這方面的研究著作很多，我在此只引 Xenia Joukoff Eudin and Robert C.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1927: A Documentary Surve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頁一八、三九~四四、六三~七〇，其中有列寧的論文和其他文件；Allen S. 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 頁四二~五八，對此有很好的分析；Helmut Gruber, *Soviet Russia Masters the Comintern: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in the Era of Stalin's Ascendancy* (Anchor Press/Doubleday, 1974), 頁二四七~九三，有分析和爭論的介紹。

② 俄國爭取北京政府承認的努力，見 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③ 這幾點在 C. Martin Wilbur (韋慕庭), *Sun Yat-sen*, 頁一一二~二四，有詳細的討論。

兩人顯然直到孫中山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即將重返廣州時，才首次見面——也許胡定康在離開西伯利亞前往中國以前，還不知道上述列寧的策略，所以並沒有在中國尋找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領袖。孫中山在與胡定康見面時，要求俄國在東北或海參崴設置一個強力無線電臺，使他在廣州的新政府可以隨時知道俄國的政策，而從中吸取經驗^④。次年年初，一個名叫亞歷西耶夫的人便在廣州成立了蘇聯「羅斯塔」(Rosta) 新聞通訊社的分社。

第二個和孫中山見面的共產國際代表，已經知道列寧的計畫了。這是個荷蘭人，名叫漢克·斯尼夫列特(Hank Sneevliet)，在中國用的名字是「馬林」。斯尼夫列特出席了第二次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並且是民族與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書記；他強烈支持列寧的理論，這和他在荷屬東印度羣島的經驗也有關係：他曾在那裏協助當地的社會黨(後來變成共產黨)在民族主義組織「回教聯盟」的羽翼下發展。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他被東印度羣島當局驅逐出境；第二次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後，共產國際派他主持中國的新支部。他抵達上海時，正好趕上參加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幾次會議。當時斯尼夫列特卅八歲，性格跋扈。他後來到漢口遊歷，並經湖南轉往桂林，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桂林與孫中山見面，作了幾次談話。張太雷擔任斯尼夫列特的嚮導和翻譯。孫大元帥那時候正準備出兵湖南，進行北伐。

在他呈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裏，斯尼夫列特(馬林)寫道，孫中山「親自告訴我，他自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他們討論了俄國承認廣州政府和俄國與廣州政府結盟的可能性，但孫中山認為在他完成北伐以前，這是不可能的。根據這份報告，孫中山表示他一旦完成北伐，會立刻提議與俄國公開結盟，俄國和中國那時可以共同解放亞洲；可是過早成立聯盟，只會引起反對他的列強進行干涉^⑤。斯尼夫列特後來回憶，孫中山曾向他詢問俄國革命的經過、俄國的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一年三月開始實行)、蘇聯使用的宣傳方式，以及紅軍中的政治訓練等問題。斯尼夫列特向孫中山指出爭取中國工人和農民支持的重要，認為這可以靠革命學生的幫助作到^⑥。斯尼夫列特離開以後沒有多久，孫中山就在一次演說中形容法國和美

④ 胡定康對他與孫中山談話的回憶，節譯於 Eudin and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頁二一八～一九。

⑤ Gruber, *Soviet Russia Masters the Comintern*，頁三六四～七五，載有「馬林同志對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譯文。

⑥ Dov Bing, "Sneevliet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CP", *China Quarterly*，第四十八期(一九七一年十～十二月)，頁六七七～九七；頁六八一～八二。

國是老式的共和，而蘇聯是唯一的一個新式共和；他說中國應該建立新式的共和^⑦。

斯尼夫列特接著前往廣州，在當地與陳炯明和其他政府領袖會談，也觀察了廣州工會的組織狀況及其與國民黨的關係。他說，當時海員罷工剛剛發生，國民黨予以財力支援，但廣州微小的共產黨團體卻與罷工工人毫無連繫，勞働國際也沒有在廣州做任何工作。從斯尼夫列特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所作的報告裏，可以看出他覺得廣州大有可為^⑧。在去北京作了短暫遊歷後，斯尼夫列特又回到上海，他向執行委員會報告說：

「我建議我們的同志放棄對國民黨的排斥態度，開始在國民黨內部進行政治工作，經由這種工作，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接觸到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小團體不必放棄它的獨立性；相反地，這些同志必須共同決定他們在國民黨內應該採取什麼戰術。國民黨的領袖告訴我，他們將允許共產黨在其黨內進行宣傳。我們的同志反而不贊成這一點^⑨。」

陳獨秀在另一份資料中證實了這項說法。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陳獨秀寫信給胡定康說，「馬林」建議中共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國民黨，但他們對此激烈反對。中共黨員在廣東、上海、北京、長沙和武漢的會議中都討論了這個問題，每個地方的黨員也都不贊成^⑩。

一九二二年四月廿三或廿四日，斯尼夫列特從上海出發，經海路到歐洲。他在中國只住了不到一年，卻協助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和孫中山討論了俄國和中國的革命（及其結盟的可能性）、對在廣州的國民黨獲得了良好的印象、發現了共產黨在當地搞工人運動的機會，而且提出了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內工作的主意。

第三個與孫中山會晤的共產國際代表是達林（Serge Dalin）。他是少年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到中國來參加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廣州舉行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一次全國勞工大會。孫大元帥那時候剛因陳炯明阻礙北伐計畫，而從桂林返回廣州；據達林說，從四月廿九日到六月十四日，他和孫中山經常見面

⑦ 國父全集，修訂本，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一九六一年出版，卷三，頁二三三~三五。

⑧ 前引「馬林同志對執行委員會的報告」，頁三七〇、三七二~七四。

⑨ 前引文，頁三七四。

⑩ V. I. Glunin, "Cominter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1920-1927)" (俄文)，收入 *Komintern i Vostok: Borba za Leninskuiu Strategiiu i i Tatiiku V Natsionalno-Osvoboditel nom Dvizhenii*, (Moscow, Glav. Red. Vost. Lit., 1969)，頁二四二~九九，見頁二五二。

①。達林在報告中寫道，他向孫中山說明，蘇聯認為中國亟需組織一個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並提出它可能採取的政綱，後來這件事就成為他們討論的主題。但不久孫中山前往韶關督師北伐，他們的討論遂告中斷。兩人在六月十五～十六日陳炯明兵變前不久又見過一次面，孫大元帥旋即被兵變逐往廣州灣內的兵艦上避難。不過孫中山仍然透過陳友仁傳話給達林，對這個俄國年輕人說，他（孫）已把所有他們「談判」的有關文件都帶到兵艦上去了。在另一封信中，孫中山對達林說：「我幾乎對我過去所相信的所有事情都感到失望，現在我確信中國革命唯一真誠的朋友是蘇聯。」孫中山同時匆匆寫了一封信給翟趣林，表示達林會向這位俄國外交部長說明一切情況，並表示自己絕不停止奮鬥。他還特別向列寧致意②。

孫中山對俄國日增的期望，也可以從他和國民黨人談論中國應該採取的外交立場上看出來。他說中國應該和蘇聯及德國結盟。據說他曾表示，中國人民不應該害怕俄國共產主義，因為俄國的新經濟政策已經把它的共產主義變成了國家資本主義③。至於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據陳獨秀說，孫中山並不贊成。陳獨秀說，孫中山曾告訴達林，他允許中共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員參加國民黨並遵守國民黨黨章，但不承認黨外的聯合④。這項說法也許是達林當時告訴陳獨秀的，因為兩人那時候都在廣州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孫中山二度在廣州成立政府失敗，回到上海，立即展開一連串活動，企圖收復自己在南方的根據地；但更重要的，他同時希望成為北京政府的總統。從我對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四日到一九二三年二月廿一日這段時期的研究，可以看出當他第三次抵達廣州成立政府時，急於得到國外的援助和國內的盟友。就在這段異常忙碌的日子裏，他和蘇聯的聯盟開始成形了。

在孫中山被陳炯明逐回上海前不久，中共於一九二二年七月舉行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接受了組織革命黨的統一戰線——特別是同國民黨組織統一戰線——的觀念。這項新態度反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遠東勞働者大會的重要主題之一，若干

① S. A. Dalin, "The Great Turn: Sun Yat-sen in 1922" (俄文)，收入 *Sun Yat-sen, 1866-1966: Sbornik Statei, Vospominanii, Materialov* (Moscow, Glav. Red. Vost. Lit., 1966) 頁二五五～八五，見頁二五五～五六。我十分感謝已故的莉迪亞·賀路尼琪女士為我將這些文章譯成英文。

② 前引文，頁二八三～八五。

③ 國父全集，卷四，頁五一八～一九。有關孫中山考慮向德國尋求援助一事，見 Wilbur, *Sun Yat-sen*，頁一〇八～一一一。

④ 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英譯文見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卷三（一九七〇年春季號），頁二二四～二五〇，見頁二二六。

中共黨員出席了那次大會。這項新態度也扭轉了一年前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制定的排他性政策^⑮。一個大致可信的解釋是，斯尼夫列特帶著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命令，說服了中共領袖加入國民黨，從內部做工作^⑯。

二、孫中山和越飛的具體討論

斯尼夫列特也擔任孫中山和越飛 (Adolf Joffe) 之間的聯絡人。越飛是蘇聯外交官，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日抵達北京，試圖和北京政府談判一項條約。斯尼夫列特又和越飛一起來中國，可能替越飛帶了一封信給孫中山，當時孫中山還在上海。孫中山和越飛通了一段時期信；蘇聯檔案中現在保存著四封越飛寫給孫中山的信及三封孫中山寫給越飛的信，但似乎均未發表過。提克文斯基 (S. H. Tikhvinsky) 教授曾摘述了這些信件，可惜沒有註明其日期或完整內容，使我們很難進行歷史研究^⑰。越飛在北京的任務失敗後，他轉往上海，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和孫中山舉行了幾次會談。雖然他們討論細節的原始材料從未公布，但這幾次會談的目的顯然在談判俄援的條件^⑱。越飛是到那時為止，孫中山所見到的最有影響力的蘇聯官員；他對莫斯科的建議會很有份量。他們後來討論到軍事問題，越飛就叫他的首席軍事顧問葛克 (A. I. Gekker) 上校到上海來參加會談；孫中山和越飛及葛克會談以後不久，便重返廣州 (一九二三年二月廿一日) 三度成立政府。這時他對俄援也許還沒有把握，因為他又試圖得到英、日、美等國的幫助。不過同年三月，克里姆林宮的領袖們決定資助他的革命政府兩百萬墨西哥銀元，五月一日又打電報給孫中山，表示「準備對中國提供必要的援助」^⑲。這句話可能是一個暗號，因為越飛一九二三年一月廿六日在上海的聯合聲明中，也用了同樣一句話。我們知道孫中山收

⑮ 陳公博，*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An Essay Written in 1924*. (Octagon Books, 1966,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贊助出版)，其中收有中共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文件；張國燾，*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1)，頁一七七～二一八，討論了遠東勞動者大會的情況。

⑯ Bing, "Sneevliet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CP", 頁六九〇；張國燾，*The Rise of the CCP*, 頁二五三～五七；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頁二二六～二七，以及其他資料。

⑰ S. L., Tikhvinsky, *Sun Yat-sen Vneshenpolicheskie Vozzreniia i Praktika* (Moscow, "Mezh Otn", 1964), 頁二四六～六六；Tikhvinsky, *Sun Yat-se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entenary of His Birth (1866-1966)*, (Novosti Press Agency Publishing House, 1966)。

⑱ 關於目前所知的孫越會談經過，見 Wilbur, *Sun Yat-sen*, 頁一三五～四〇。

⑲ A. I. Kartunova, "Sun Yat-sen and Russian Advisers; Based on the Documents from 1923-1924" (俄文)，收入 *Sun Yat-sen, 1866-1966: Sbornik Statei, Vospominanii, Materialov*, 頁一七〇～八九，見頁一七一；Kartunova, "Sun Yat-sen: a Friend of the Soviet People" (俄文) *Voprosy Istorii KPSS*, 九卷十期 (一九六八年十月)，頁二七～三八，見頁三四。

到了這封電報；五月廿四日，他交給斯尼夫列特（當時又到了廣州）一封電報，請他打給越飛。這封電報現在收藏在阿姆斯特丹的斯尼夫列特檔案裏。孫中山在電報中要求蘇聯撥付第一批款項，並表示他計畫改組國民黨，以及在中國各大城市辦報紙和雜誌^②。

從四月底到七月底，斯尼夫列特一直在廣州。他參加了一九二三年六月的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運用他的影響力說服大會代表同意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政策。他也經常與孫中山見面，嘗試說服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將國民黨變成一個羣眾的黨，並放棄征服整個廣東的企圖。我們不知道孫中山對這個跋扈荷蘭人的意見有何反應；斯尼夫列特當時主張除非孫中山改造國民黨，蘇聯不應該給他武器和金錢。「國父年譜」裏沒有提到「馬林」第二次到廣州來的情形，不過記載了馬林離粵赴滬以後，孫中山曾命令蔣介石和他討論蔣介石到蘇聯考察的問題^③。斯尼夫列特當時已失去了越飛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重要成員的信任^④。

因此，到一九二三年夏天為止，孫中山已和三位共產國際的代表（胡定康、斯尼夫列特和達林）、一位高層外交官（越飛）和一位蘇聯軍官（葛克）作過試探性的會談。透過這些人的報告，蘇聯領袖們知道了孫中山是怎樣一個人，從而決定支持他。同年六月初，葛克上校在莫斯科挑選了一批年輕軍官，打算派他們到廣州去幫孫中山改革軍隊^⑤。更重要的是，政治局選派鮑羅廷（Michael Borodin）去協助和引導孫中山，同時又派加拉罕去和孫中山的敵人——北京政府——談判一項互相承認的條約。加拉罕於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率團抵達北京，鮑羅廷則繞道東北和張作霖會談，晚了幾天才到。九月二日也是蔣介石率團抵達莫斯科的那一天，他奉孫中山之命到俄國去進一步了解紅軍的狀況，並且（如果可能的話）說服克里姆林宮與孫中山合力攻佔北京^⑥。

加拉罕大使是個手腕靈活的外交官，對公共關係十分在行；他和北京政府簽訂

① Tony Saich, "Hank Sneevliet and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1921-1923)", 提交第二屆中歐學術會議的論文，英國牛津，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廿四日。賽奇博士曾向我出示一封有孫中山親筆簽名的電報影印本。

② 國父年譜，第三版（兩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一九六九年出版，見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條下。

③ Tony Saich and Fritjof Tichelman, "Hank Sneevliet: a Dutch Revolutionary on the World Stag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一卷二期（一九八五年）。

④ A.I. Cherepanov, *As Military Adviser in China*.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2), 頁一六。這是切列潘諾夫兩本在華任職回憶錄（俄文本分別出版於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八年）的英文節譯本。其中對蘇聯向國民革命軍施予軍事援助的經過，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資料。

⑤ 見 Wilbur, *Sun Yat-sen*, 頁一五一～一五三，該書係根據俄國檔案。

了條約（一九二四年五月卅一日），也使蘇聯與中國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不過他和病重前的孫中山的聯絡，則完全靠通信的方式進行。

三、鮑羅廷的背景和任務

孫中山和鮑羅廷的關係是個非常大的題目，我們在此只能大略談一談。要想進一步了解這個題目，應該讀莉迪亞·賀路尼琪（Lydia Holubnychy）所寫的「鮑羅廷與中國革命，一九二三~一九二五年」（*Michae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3~1925*）^{②⑤}，那本書充分引用了俄文、中文和西方語文的材料。

鮑羅廷（本名格魯曾伯格 Grusenberg）同時代表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他來到中國時才三十九歲，可是已經具有豐富的革命經驗。年輕時他屬於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派，一九〇六年因為從事顛覆活動而被迫離開俄國；在英國待了一個短時期後，他到美國住了十年，一九一八年才回到俄國跟列寧工作。一九一九年共產國際成立，他先後成為其駐歐洲數國和墨西哥的代表；一九二二年，他以「喬治·布朗」的名字被英國政府逮捕，次年春天遞解回俄，接著就奉命前往廣州。他和大部分重要的蘇聯領袖都熟識，又會說流利的英語——和孫中山一樣^{②⑥}。

鮑羅廷携有書面指令，但據我所知，這些指令至今尚未發表^{②⑦}。他對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和五月廿四日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指令一定知之甚詳，因為他在廣州的工作多半是照這些指令進行的。共產國際指令的要點如下：中國最主要的工作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華代理人的國民革命，而中共和國民黨該共同行動；共產黨人應該留在國民黨內，但必須保持本身的獨立性，同時反對任何國民黨討好資本主義列強及其代理人的企圖；他們必須影響國民黨，使國民黨與蘇聯一致對抗歐洲、美國和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必須無條件地支持中國的工人運動，而中共應該組織工人作它的羣眾基礎；國民黨必須經由有系統的宣傳，形成一個廣泛的全國性運動，儘可能地吸引廣大羣眾參加反對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的鬭爭；中共必須不斷引導國民黨支持農民革命、堅持沒收土地以扶助貧苦的農民，從而使農民也支持孫中山的革命軍；中共必須盡一切力量防止孫中山和軍閥結盟，並要求國民黨儘快舉行代表大

②⑤ 一九七九年由密執安大學國際徵卷中心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

②⑥ 鮑羅廷的革命經歷，在賀路尼琪女士書中的第一章，以及 Dan N. Jacobs,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的前一百頁，有詳細的描述。

②⑦ 賀路尼琪女士指出，近代俄國學者獲准摘引指令中的一句話，但顯然沒有見到指令的全文。見 Holubnychy, *Michael Borodin*, 頁二三六。這句話的譯文是「遵從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絕不要被在中國硬搞共產主義的目標沖昏了頭」。

會，以集中精力形成一個廣泛的全國民主陣線²⁸。

四、孫中山和鮑羅廷開始共同工作

鮑羅廷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六日抵達廣州；在接下來的幾星期裏，他和孫中山及其他國民黨領袖經常見面。他早期的報告和言論，顯示他企圖以公開奉承的方式來博取孫中山的好感，並在私人談話中贏得孫中山的信任。從一開始，他就強調改組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爲一個有羣眾基礎的國民革命主導者的必要；他也強調國民黨必須採取一種明確的反帝國主義立場。他推崇蘇聯是成功的革命範例，而且把俄國革命的意識型態和三民主義連繫起來。他同時致力於讓中國人覺得他和其他壓迫中國的外國人不同——他是來爲中國服務的。

孫中山很快就有了反應。十月廿五日，他任命了一個臨時中央委員會，負責起草國民黨黨綱和黨章，並籌備全國代表大會；鮑羅廷被任命爲這個委員會的顧問。同一天，孫中山打電報給在莫斯科的蔣介石，叫他向「友邦政府及政黨」就「派代表鮑羅廷到粵援助之熱心與誠意」表示感謝²⁹。

鮑羅廷也和廣州的中共和社會主義青年團領袖會晤，向他們私下保證中共的利益仍然高於一切。他說：「我在報紙上談的是國民黨，但對我們而言，歸根結底，我談的是擴大共產黨的影響力……絕不要忘了我們的工作事實上是在穩定共產黨，這個目標要牢牢記住³⁰。」

十一月，陳炯明幾乎打下廣州。在這個軍事危機中，鮑羅廷企圖說服孫中山發佈命令，立法保護勞工和沒收地主土地分給佃農，以爭取羣眾的支持。孫中山同意了第一項，但拒絕實施第二項。據鮑羅廷說，孫中山只答應推行二五減租和設立農會³¹。不過在孫中山死前，減租命令始終沒有發佈。

五、改組國民黨

在鮑羅廷與孫中山及其黨人合作的第一階段裏，最大的成就便是改組國民黨和

²⁸ 兩件指令的譯文均見 Eudin and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頁三四三~四六。

²⁹ 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三年十月廿五日條下。

³⁰ N. Mitarevsky, *World-wide Soviet Plots, as Disclosed by Hitherto Unpublished Documents Seized at the USSR Embassy in Peking*, 天津一九二七年出版。米塔瑞夫斯基任職於負責翻譯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搜查北京蘇聯武官處時所得文件的委員會，他的書中摘錄了鮑羅廷在粵初期向加拉罕所作的報告，頗具參考價值；雖然不見於他處，但其歷史正確性已獲證實。這本書不可因題意偏頗而不予重視。

³¹ Cherepanov, *As Military Adviser*, 頁三三~四〇；Louis Fischer, *The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2 Vols., London and New York, Jonathan Cape, 1930), 頁六三七~三八。這兩本書的根據都是鮑羅廷自己對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危機的描述。

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二四年一月）。爲了完成這兩件工作，臨時中央委員會舉行了多次會議、黨員重新辦理了登記、招收了新黨員、選舉了大會代表（其中一半由孫中山任命），又起草了新黨章和黨綱。黨章是鮑羅廷親自起草的，由廖仲愷將它翻譯成中文^②。根據這份黨章，國民黨的結構完全比照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而面目一新。鮑羅廷的草案在作了若干修正後，由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其中一項重要的修正，是草案中黨的領袖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而正式通過的黨章則以「孫先生爲本黨總理」和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當然主席，對這兩個機構的決議都有否決權^③。作這項修正的原因，是爲了消除某些聲望甚高的黨內元老的恐懼，他們擔心在鮑羅廷的操縱下，五年內陳獨秀便會當選爲國民黨領袖^④。

國民黨的宣言和黨綱也都顯示了鮑羅廷的影響。它們與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廿八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鮑羅廷於十二月卅日在上海接到，當時他正準備回廣州——簡直若合符節。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希望重新定義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應該是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鬭爭，得到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商人和企業家的廣泛支持；民權主義應該是符合勞動者利益的「革命民權」——只有支持反帝鬭爭的人才能享受民主權利；民生主義應該是將外國公司、企業、銀行、鐵路和內河航運收歸國有，但不能解釋爲土地由國家收歸國有。共產國際還希望國民黨支持中共，並建議中共盡一切力量幫助國民黨；最後，國民黨也應該了解到與蘇聯合力對抗帝國主義的必要^⑤。

這些觀點大部分都出現在國民黨的宣言和黨綱裏，但並非照單全收。鮑羅廷花了很大力氣，企圖寫進一句沒收大地主和不在地地主土地、將它分給佃農的條文，也企圖寫進一句明白指出中國國民革命和蘇聯結成聯合戰線的條文，但孫中山不願意這樣激烈。在宣言交付表決之前，孫中山幾乎決定撤回整個文件；經過鮑羅廷極

② 初刊於國民黨週刊，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廿五日，重印於嚮導週報，第五十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廿九日）。

③ 革命文獻（羅家倫等編纂，臺北自一九五三年起出版迄今），卷八，頁一一三八～三九，第四條第十九至廿四款。

④ 「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彈劾共產黨案及總理之批示」，收入「彈劾共產黨兩大要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一九二七年九月。重印於革命文獻，卷九，頁一二七八～八六，但無孫中山的手書批示。

⑤ “Resolution, Presidium, Communist International/Executive Committee, On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in China and the Kuomintang Party”, *Kommunist* (Moscow), 四十五卷四期（一九六九年三月），頁一二～一四。英文譯文由蘇聯新聞社「諾佛斯提」（Novosti）於一九六九年四月在紐約發表。

力勸阻，才向大會提出。一九二四年一月廿三日大會通過了宣言和黨綱，它們旨在爭取中國大部分階級的支持、強烈反帝，也依照共產國際的想法重新說明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③⑥}。

對孫中山和他幾個最熱心的同志——特別是廖仲愷、汪精衛和胡漢民——來說，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大勝利。來自中國各地和海外的革命與改革派領袖，首度在孫中山的主持下共聚一堂；代表中有廿位左右是「跨黨分子」。大會通過了將國民黨組織中央集權化的計畫，並且推出新的黨綱；大會也通過了孫中山挑選的中央委員會，然後由中央委員會在廣州成立中央黨部，主持全國的黨員招收和宣傳工作。有好幾個月，鮑羅廷每月津貼中央黨部三萬元墨西哥銀洋，但後來幾個資深黨員發現他擅改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通過的預算，遂決定改由廣州的稅收機關負責籌款^{③⑦}。孫中山在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幾次演說，其中一次是他十六回三民主義講演的第一回；在這些講演中，很容易看出鮑羅廷和他談話的影響，不過基本的觀念還是他自己的。

大會閉幕之後，孫中山寫信給翟趣林，感謝他派鮑羅廷來幫忙：「……我對鮑羅廷同志在國民黨改組方面所給予我們的協助，表示誠摯的謝意。他實在非常可貴，他的來訪顯然是一件大事^{③⑧}。」但儘管孫中山接受了許多鮑羅廷的建議，最後應該怎麼做的決定權還是在他；他們的意見也不盡一致。有時候鮑羅廷發現要改變孫中山的想法簡直不可能。因此，國民黨的重新塑造和新革命方向的制定，是兩個有經驗的革命家相互影響的結果；這兩個人的個性都強，對未來中國的設想也不一樣。另一方面，他們也受到孫中山的老同志和鮑羅廷在莫斯科的上司的協助與牽制。

三月初，鮑羅廷到北京去與剛完成條約談判的加拉罕磋商。當他於六月二十日回到廣州時，關於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目的和活動的爭議，已經在醞釀了^{③⑨}。新成立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謝持和張繼，在上海看到解釋中共黨員加入他黨之真正目的的文件，立刻到廣州提出彈劾。鮑羅廷和孫中山必須應付這個極為不利的形

^{③⑥} Cherepanov, *As Military Adviser*, 頁五五~五八，引述鮑羅廷的筆記。頁六〇~六一的摘要清楚地顯示了兩者的相同之處。又見 Holubnychy, *Michael Borodin*, 頁三五~五八。

^{③⑦}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二版，臺北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五年出版，頁四四七~四八；Holubnychy, *Michael Borodin*, 頁四〇二，根據近代俄國學者的研究討論了鮑羅廷的津貼。

^{③⑧} Holubnychy, *Michael Borodin*, 頁三七三，摘引了俄國編的孫中山文集。

^{③⑨} 關於這項爭議，我所見到最完整的當時記載是：肅清（筆名），「共產黨之陰謀大暴露」，廣州三民俱樂部出版，前言日期為一九二四年八月廿七日。

勢。從六月廿五日鮑羅廷和謝、張二人談話（孫科擔任翻譯）的中文紀錄看來，鮑羅廷似乎明白表示，國民黨要想繼續得到俄援，共產黨人就得留在國民黨內^④。

鮑羅廷建議孫中山設立一個由親信助手組成的小型委員會，對他提供政治問題的建議。孫中山於是在七月十一日依計行事，任命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譚平山（後來改為瞿秋白）、伍朝樞和邵元冲為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孫中山自任主席，鮑羅廷是顧問。這就是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也可以稱為政治局——的濫觴^⑤。政治委員會決定如何處理紛至沓來的有關共產黨問題的抗議——基本上，它的處理方式是一切照舊。鮑羅廷保存了一份政治委員會的會議紀錄，也保存了其他國民黨中央機關的會議紀錄；政治委員會後來成為他對國民黨運用影響力的主要工具。

六、軍事上援助孫中山

孫中山在鮑羅廷協助下的第二項成就，是為建立一支訓練精良、有政治認識，而且效忠於他和新革命主義的軍隊，奠下了基礎。鮑羅廷起初得到四名葛克所挑選的俄國軍官的協助——雅可夫·古爾曼 (Yakov Guerman)^⑥、尼可萊·特瑞沙托夫 (Nikolai Tereshatov)、佛拉迪米爾·波利亞克 (Vladimir Polyak)，和亞歷山大·切列潘諾夫 (Alexander I. Cherepanov)。切列潘諾夫曾寫過一本關於俄國代表團在廣州的軍事工作的完整回憶錄。當他們第一次見到孫中山時（顯然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初），孫中山對他們說：「我們的第一項任務是仿效蘇聯的形式建立一支軍隊，並且準備一個北伐的基地^⑦。」創辦一所訓練下級軍官的軍校的計畫，當時已經開始着手了^⑧。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軍校學生除了接受軍事訓練以外，還得接受有系統的國民黨政治教育。這支新軍隊將是一支經過意識型態灌輸的軍隊，可以為黨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目標而奮鬥。軍校最早的規章^⑨裏，在最高層組織中

^④ 原文見革命文獻，卷九，頁一二八六~九一；又見 Wilbur, *Sun Yat-sen*, 頁二二二~四二。

^① 國父年譜，卷二，頁一一〇三。

^② Vera Vladimirovna Vishnyakova-Akimova, *Two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1925-1927*, 由 Steven I. Levine 譯成英文，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一九七一年出版，頁二二二。這是作者在孫中山死後一年左右的個人觀察紀錄。

^③ Cherepanov, *As Military Adviser*, 頁七〇。

^④ 關於黃埔軍校的最近兩項研究是黃埔軍校史料，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廣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以及黃埔軍校六十週年論文集（兩卷），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臺北一九八四年出版。後者收有一篇陳存恭所寫的討論俄國顧問的論文。

^⑤ 「廣州國民軍軍官學校規章」，收入即將出版之 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 *Soviet Advisers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0-1927*, 文件之四。這也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蘇聯武官處搜查到的文件之一，日期似乎是一九二四年二月或三月。

有政治部主任一職，掌管校內的政治生活；這也就是「黨代表」制。孫中山後來任命廖仲愷為軍校黨代表、蔣介石為校長。軍校的籌備工作還沒有完成，前來應試的學生已紛紛抵達廣州，他們是由各地國民黨員（包括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員）負責招募的。經過仔細的甄選，國民黨從數千名應試者中挑出四百七十名，於五月初進入黃埔島上的陸軍軍官學校，成為第一期學生。在六月十六日的開學典禮上，孫中山向學生發表了一篇激動的演說，表示他深信他們會對國民革命作出貢獻。這是他晚年的盛事之一。蘇聯對軍校作了觀念和財力上的雙重支援。到當年十月為止，鮑羅廷每月提供十萬元粵幣作為軍校經費^④，廣州的納稅人也出了不少錢。蘇聯的軍事顧問致力使軍校學生達到俄國的戰術標準，在軍事訓練方面出了很大力^⑤。

孫中山的首席軍事顧問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帕夫洛夫 (P. A. Pavlov) 將軍。他於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日，隨同自北京南返的鮑羅廷一起抵達廣州。帕夫洛夫發現當時最困難的問題，是使廣州一帶在名義上支持孫中山和國民黨的各式各樣軍隊團結起來。他提議成立軍事委員會作為最高指揮機關，孫中山雖然照辦了，但這個委員會直到孫中山北上很久，才真正發生效用。帕夫洛夫到廣州後一個月，便不幸溺水而死，孫中山下令公開舉喪，並致電蘇聯政府說：「謹對帕夫洛夫將軍的去世致深切的哀悼，他的去世是俄國在為中國爭取自由的鬪爭中，所作的第一項犧牲。我們鄰國這位勇敢而高貴的子民，並未白白地付出生命；他已使俄國和中國更親密地携手，而且加強了國民黨在民族自決鬪爭中獲取勝利的決心^⑥。」

接替帕夫洛夫的是聰明而自學出身的布魯徹 (Vasilii K. Bliukher) 將軍，他在中國使用的名字是「加倫」。布魯徹於十月底抵達廣州，當時孫中山正在指揮第三次北伐。他們兩人雖然見了面——孫中山對他的前來表示感謝——但布魯徹似乎並沒有協助孫中山作戰。也許那時候作戰已經結束了，因為我們不知道布魯徹抵粵的確實日期。布魯徹最初集中精力於了解廣東的複雜軍事狀況，後來他就此寫了一份非常有趣的報告^⑦。他也建議孫中山重建軍事委員會。蘇聯援助的第一批武器，

^④ Holubnychy, *Michael Borodin*, 頁四一二~一三，引述了幾種俄國學者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 A. I. Kartunova, "Vasilii Bliukher (1889-1938)", 收入 *Vidnye Sovetskie Kommunisty Uchastiniki Kitaiskoi Revolutsii* (Moscow, Akad. Nauk SSSR, Institut Dalnego Vostoka, "Nauka", 1970), 頁五四~五五，該文係根據布魯徹的日記。

^⑤ 關於一九二〇年代蘇聯在華軍事顧問的一項有系統的研究，是 Dieter Heinzig, *Sowjetische Militärberater bei der Kuomintang 1923-1927*, (Baden-Bad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1978)。

^⑥ Cherepanov, *As Military Adviser*, 頁九四。

^⑦ 這是上述 Wilbur and How 即將出版之新書的文件之三。

十月七路由「佛洛夫斯基」號運到廣州，距孫中山當初要求這項援助幾乎整整一年。「佛洛夫斯基」號帶來了數千支來福槍、機關槍、大砲和彈藥，這批武器來得正是時候，因為孫中山當時面臨著廣州商團之亂，而且軍校的第二期學生（人數更多）剛剛入學，又馬上需要組織一個教導團。自此以後，俄國向國民黨提供了大批武器，但多半在孫中山去世後才運到。那時俄國已增派了兩批軍官（總數在十五人以上）到軍校教書或組織新教導團；孫中山北上後，他們在布魯徹的指揮下，對第一次東征頗具貢獻。

七、組織廣東農民

共產國際力主國民黨應該建立羣眾基礎。中共特別注意工業無產階級，企圖從國民黨手裏把工會的領導權奪過來。但絕大多數的中國民眾是鄉下人——「農民」。我們提到過鮑羅廷曾希望說服孫中山採取一種激烈的土地政策，沒有成功。他後來設法讓國民黨在中央黨部裏成立了農民部，由林祖涵（跨黨分子）擔任第一任部長，秘書則是彭湃。彭湃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領袖之一，曾在故鄉海豐縣組織佃農，結果被陳炯明趕了出來。鮑羅廷的任務是鼓勵、資助農民部與農民運動講習所。

孫中山和他的主要助手不僅在激烈的土地政策上、而且在組織農民的目的上，意見都不一致。孫中山自己是個改革主義者，反對階級鬭爭。一九二四年八月，他在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屆畢業生的畢業典禮上，叫他們不要鼓勵階級鬭爭；他說，他們應該鼓勵農民參加國民革命，國民革命成功了，新政府會以法律方式解決農民的問題；農民應該組織農會，可是也應該和其他階級合作。孫中山說：「你們尤其應該勸農民和政府合作，並且仔細研究解決農民和地主關係的方法，使農民受益、地主也不吃虧^⑤。」但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鮑羅廷相信階級鬭爭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主持農民部和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年輕共產黨人也這麼相信。在孫中山北上以前，地主和新組織起來的佃農之間已時生流血衝突，這種情形在廣東西北部的廣寧縣特別嚴重。

八、對孫中山在意識型態上的影響

孫中山的反帝國主義立場，源自他對中國從十九世紀以來受不平等條約壓迫的

^⑤ 中國國民黨週刊，第卅六期（一九二四年八月卅一日）；國父全集，卷三，頁四六〇～六四。

認識。也由於沒有一個列強承認他在廣州的政府，他對列強的怨恨更形深刻。列強承認北京政府，在財務上對北京助益甚大；孫中山特別不滿廣州海關的稅收必須北繳，主張廣州政府應該分得一部分。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他威脅要封閉廣州海關，任命他自己的海關監督，結果列強派出軍艦制止，他只好讓步。這個事件發生時鮑羅廷正在上海，孫中山經此挫折，變得更傾向蘇聯和更反帝國主義。在此之前，鮑羅廷和其他共產國際代表都曾向孫中山宣傳過反帝的思想。目前雖然很難斷定在各種歷史、心理和個人因素中，那一項比較重要，但很明顯地，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和國民黨在外觀和宣傳上，都遠比以往強調反帝。不過鮑羅廷始終沒有（如果他試過）說服孫中山作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只能說服孫中山將革命後的俄國當作恩人。

鮑羅廷對國民黨的宣傳機關極感興趣，曾津貼國民黨在廣州、香港、上海和北京的報紙與雜誌，並出錢印刷傳單和小冊子^①。他還向黃埔軍校學生、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和其他的革命新血發表演說。

九、孫中山和鮑羅廷最後的關係

孫中山在廣州的最後幾星期裏，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廣州商團事變，一件是孫中山的第三次北伐。鮑羅廷對孫中山如何對付商團叛亂提供了意見（這本身就說來話長），也是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黎明，指揮軍隊進攻商團的「革命委員會」的顧問。除了孫中山的親信同志以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還包括最近才到廣州的周恩來^②。孫中山進行第三次北伐的決定，必定與鮑羅廷的意見不符，因為這和他們兩人在廣州所致力的一切工作——重振國民黨、號召羣眾參加革命、建立效忠黨的新軍隊——都格格不入。爲了從事北伐，孫中山再度投入國內的武力政治之中，希望很快攻佔北京。這不禁使人懷疑他到底接受了多少鮑羅廷的革命方案。

馮玉祥於十月廿三日夜在北京發動倒吳佩孚的兵變，他和段祺瑞、張作霖旋即邀請孫中山到北京來共商國是，籌劃和平統一。孫中山因此急忙趕回廣州（十月三十日）；現在他完全熱中於準備進北京了，這是他多年來的夢想。他於十一月十

^① Holubnychy, *Michael Borodin*, 頁四〇二，它的根據是上述 Kartunova 的研究，而後者的根據則是蘇聯檔案。布魯徹在他十二月一日的日記裏，記載廖仲愷對他說，鮑羅廷一直在支付國民黨各部職員的薪水，共計五千零十元粵幣；另外還支付粵幣一千五百三十元印刷費，和以下各項津貼：兩千元港幣給香港報紙、一千元粵幣給廣州報紙、六百元港幣給上海「新建設」雜誌、六百元港幣給北京「新民國」雜誌。這些必然是指每個月的金額。

^② 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頁一七〇~七三，這是鮑羅廷十月十四日的一份報告，當時平亂能否成功還沒有把握。

三日——也是他照西方算法五十八歲生日的後一天——啟程，從香港乘「春陽丸」到上海，同行的有他的妻子和十八名隨員；鮑羅廷則於同一天與陳友仁乘「曼杜亞」號出發⁵³。畢竟，讓人看見孫中山和他的「布爾什維克」顧問同船抵達上海，是不大妥當的事。

孫中山接著先到日本，企圖爭取該國支持他在即將舉行的北京談判中的地位。然而等他在十二月四日抵達天津時，卻染上了重病。鮑羅廷也許在天津就見到了孫中山，當病重的孫中山被抬進北京以後，鮑羅廷更是經常去看他。孫中山住進北京協和醫院的那一天，任命了幾位當時在北京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組織一個臨時政治委員會，鮑羅廷仍然擔任顧問。汪精衛替孫中山起草的遺囑，就曾經過這個委員會的批准。孫中山將告不起時，陳友仁在和鮑羅廷商量過以後，代孫中山寫了一封給蘇聯同志的告別信；他們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把這封信唸給孫中山聽，第二天孫中山就去世了。據說他同意了這封信的內容。照鮑羅廷自己的說法，孫中山在死前不斷喃喃地說：「只要俄國人繼續幫忙……只要俄國人繼續幫忙⁵⁴。」

孫中山是個基督徒，宋慶齡和其他家屬希望為他舉行追思禮拜，因此在他去世後一星期，家屬們在協和醫院大廳舉行了基督教儀式。公開的喪禮緊接著舉行，前往弔唁的貴賓中，包括蘇聯大使加拉罕和若干大使館人員。

十、結 論

在他革命生涯的最後幾年裏，孫中山得到了鮑羅廷和到廣州來的俄國軍官很大的幫助。這些俄國人是他們政治信仰的傳道者，就像十九、廿世紀到中國來傳播基督教義的外國傳教士一樣。蘇聯顧問團使國民黨開始變成一個效率十足和中央集權的政黨，具有吸引中國愛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和社會政策；他們也為明瞭主義、紀律整齊的國民革命軍打好了基礎。

鮑羅廷和布魯徹所領導的蘇聯顧問團，後來人數大幅增加，他們在國民黨及其軍隊中一直工作到一九二七年夏天。不久，暴力社會革命所引起的強烈反應，迫使

⁵³ 國父年譜，卷二，頁一一五四~五五，載有孫中山隨員的名單。據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二日英文北華捷報（頁三四四）的報導，兩艘輪船都在十一月十九日抵達上海。它說「曼杜亞」號上有「Mr. and Mrs. Broden. Mr. Ceilko, 和陳先生」，Ceilko 可能是當時蘇聯駐廣州的代理領事，陳先生則必然是陳友仁。

⁵⁴ Wilbur, *Sun Yat-sen*, 頁二七五~八二，根據中、俄、英文的資料和英、美大使從北京發回本國的電報，描述了孫中山患病、去世和喪禮的情況。關於孫中山死前的喃喃之語，另有其他說詞，在此不另引。

這些蘇聯「傳道者」鎩羽而歸，但他們的影響依然存在。

他們回國之後的遭遇如何？在俄國發生的兩樁可怕事件，斷送了他們之中大部分人的性命——這就是一九三〇年代末期的斯大林恐怖整肅，和一九四一到四五年的對德戰爭。我們在此只略談幾個和孫中山一起工作過的人⁵⁵。

胡定康後來成爲蘇聯科學院和莫斯科大學的教員及資深研究員；他於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一日去世，享年六十歲。漢克·斯尼夫列特（「馬林」）一九二三年結束和孫中山的合作後回到荷蘭，他脫離了共產國際，但在歐洲的左翼反對派組織中非常活躍；二次大戰期間，他領導反抗德國佔領軍的地下活動，不幸被捕，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二日遇害，享年五十九歲。達林從一九三七年被放逐後，就未再擔任蘇聯官職；斯大林死後他回到莫斯科，寫下了他和孫中山談話的回憶，這篇文章收錄在一九六八年爲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而出版的一本論文集裏，一九八五年去世。越飛在到中國和日本談判相互承認的條約失敗後，精神崩潰，赴維也納接受治療；他在政治上屬於與斯大林爭權的托洛茨基派，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他憤而自殺，以示對朋友被逐出黨的抗議，當時只有四十四歲。葛克於一九二五年成爲蘇聯駐北京大使館的武官，然後奉派前往土耳其；一九三四到三七年，他擔任紅軍參謀總部的的外交處長，但一九三七年被秘密警察逮捕，同年七月一日處決，時年四十九。後來他恢復了名譽。

加拉罕當時主要的職責在北京，一九二六年他回到莫斯科，繼續在外交部工作，接著又出使土耳其（一九三四到三七年）；一九三七年他奉召回國，旋即被捕，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在獄中處決，時年四十八，是斯大林暴政下的又一個受害者。廿五年後黑魯曉夫主政期間，他恢復了名譽。鮑羅廷活得比較久。雖然一九二七年他的在華任務一敗塗地，斯大林仍允許他在莫斯科擔任一個普通的工作，但一九四九年他企圖協助安娜·路易斯壯（Anna Louise Strong）宣傳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人在延安的成就，受到了牽連，兩人都被逮捕；他被放逐到偏遠的西伯利亞，於一九五一年五月廿九日去世，享年六十七歲。他後來也恢復了名譽。

布魯徹將軍從中國回到俄國後青雲直上，成爲遠東特遣軍的總司令，並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受封爲蘇聯五大元帥之一。但接著斯大林就對這個頗受愛戴的英雄下手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布魯徹被捕處決，享年四十九歲。他如今在俄國極

⁵⁵ 此處係取材自 Wilbur and How 即將出版之 *Soviet Advisers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一書的後記。

受敬仰。

孫中山在廣州時，另外還有十八位蘇聯男軍官和一位女軍官來華。其中三位（米拉·茱貝瑞娃 Mira Chubereva、斯提潘諾夫 U. A. Stepanov、烏格爾 D. Uger）死於斯大林的整肅，另外三位（貝夏斯特諾夫 T. A. Beschastnov、佛洛培夫 I. Vorobev、切列潘諾夫 A. I. Cherepanov）參加了對德戰爭而且幸運生還。貝夏斯特諾夫於一九四七年去世；切列潘諾夫是「在中國當軍事顧問」（*As Military Adviser in China*）一書的作者，一九八四年去世，當時已高齡八十九。至於其他幾位返俄後的情況，我們還查考不出來。